

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之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分化与改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两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它们既对抗又妥协，既争夺又勾结。为使自已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美苏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不仅保持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苏联则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边界流血冲突，从北面威胁中国的安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席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间地带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我国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毛泽东主席指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中国大力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积极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

中国奉行睦邻政策，通过友好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订了边界条约，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协定。同印尼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同亚非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的互访日益频繁。从万隆会议后到60年代末，有22个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在此期间，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不断到亚非地区进行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周恩来总理更是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访问，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卓越外交活动使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发展。特别是法国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拒绝签署美苏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突出地反映了西欧不甘受美控制，积极谋求独立自主的趋向。在毛泽东主席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但同早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增进了友谊，而且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派了商务代表。

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日本过去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新中国始终把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以严格区分。中国真诚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日本某些领导人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在坚持反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民间关系。我国采取主动步骤，沟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不断加强两国各类民间组织间的交往。所有这些，在日本引起良好反响。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为七十年代初两国建交打下了基础。

第三、反对苏联控制，顶住苏联的威胁。五十年代末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妄图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并为此向我国提出诸如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他还竭力使我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放弃原则，以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遭到我国断然拒绝。对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本应通过讨论加以解决，但苏联领导人却采取高压手段和突然袭击方式，企图迫我屈服。这一图谋失败后，苏联继而采取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1960年7月苏联在一个月之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中苏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三百多个专家合同，废除二百多项科技合作项目，继而在我国新疆一些地区挑起边境纠纷。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对苏联的霸道行径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但为尽可能维护中苏友谊，我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期望苏联悬崖勒马，改弦易辙。但苏联领导人依然故我，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甚至入侵我珍宝岛等地，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还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的边缘。面对苏联的军事挑衅，我国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击退了苏联的多次武装入侵。1969年9月，应苏方要求，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谅解。

第四、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叫嚣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国为缓和中美关系，努力争取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但美国根本没有诚意，会谈旷日持久，还数度陷入僵局和中断。与此同时，美国恣意策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美舰为其

护航，扬言“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为粉粹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串犯大陆的图谋，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慑于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海域为蒋军护航存在的风险，加之大批军舰滞留台湾海峡对美国全球战略不利，美国政府遂转而力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实现“划峡而治”，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分离。美国的这一建议未被接受。我也及时识破了美国险恶用心。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先后采取暂停炮击和逢双日不炮击等作法。正如毛主席所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围绕炮打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场斗争，有力地挫败了美国的阴谋。

1955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插手印支事务，破坏协议的执行。美国从出钱、出枪、出顾问，让越南人打越南人，一直发展到出动几十万军队，对越南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美国还策动老挝内战，对柬埔寨进行颠覆和侵略。印支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我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直至取得完全胜利，用实际行动证明，“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同样，在谈判桌上，我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有力地捍卫了印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克服了来自美国的种种阻挠，同与会国共同努力，于1962年7月达成老挝和平、中立的协议。我国全力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抵抗美国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直至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全国。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五十个。中国已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